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杨义文存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 杨义文存

第二卷

## 目 录

- 1 第一章 从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看“五四”小说革命的必然和必要
- 1 第一节 小说理论变迁与启蒙主义思潮
- 19 第二节 清末小说的繁荣、虚浮和探索
- 37 第三节 民初小说的蜕变、逆转和新追求
- 69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时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 69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及其性质
- 87 第二节 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
- 123 第三节 现代小说头十年的大势
- 123 一 分期与发展趋势
- 138 二 收获与突破
- 157 第三章 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
- 157 第一节 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
- 174 第二节 开创一个伟大的文学主潮
- 192 第三节 小说艺术的大突破
- 213 第四章 在妇女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女作家群
- 213 第一节 女作家群出现的历史意义及其特点

234	第二节 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代表性作家
234	一 问题小说
243	二 创作基调的变迁
253	三 优秀的文体家
261	第三节 庐隐：哀感绵绵的抒情作家
261	一 借小说以“为我象征之用”
271	二 个人的悲哀与时代的悲哀
278	三 融合中西的婉约文风
285	第四节 其他女作家
285	一 冯沅君
291	二 凌叔华
298	三 苏雪林
306	第五章 人生派小说
306	第一节 人生派与文学研究会
326	第二节 叶绍钧：真诚的人生派作家
326	一 为人生的文学在探索中成熟
335	二 现实主义的新境界和新收获
341	三 多种小说形式的开拓者
349	四 朴实浑厚的艺术风格
357	第三节 王统照：开放型的现实主义
357	一 早期创作方法的驳杂
365	二 现实主义的成熟和变异
376	三 探索的广泛与风格的发展
384	第四节 许地山：由传奇到写实
384	一 举传奇的旗帜走进人生派
394	二 在为人生宗旨下转向现实主义
401	三 风格的奇特清妙和苍劲凝实

- 408 第五节 王任叔：勤奋探索与坚实成就
- 408 一 创作方法渐入佳境
- 415 二 在坚实的基础上求深求广
- 425 第六章 乡土写实派小说
- 425 第一节 乡土写实派的兴起及其特点
- 441 第二节 鲁彦：乡土写实的后起之秀
- 441 一 探求于抒情和写实之间
- 448 二 从“屋顶下”到旷野间
- 455 三 朴实细密的乡土写实风
- 462 第三节 废名：田园风格的乡土作家
- 462 一 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
- 471 二 静美与朴讷的艺术风格
- 480 第四节 寓居北京的乡土写实作家
- 483 一 许钦文
- 494 二 蹇先艾
- 505 三 台静农
- 513 四 黎锦明
- 521 第五节 寓居上海的乡土写实作家
- 522 一 许杰
- 532 二 彭家煌
- 541 第七章 浪漫抒情派小说（上）
- 541 第一节 浪漫抒情派与创造社
- 559 第二节 郁达夫：浪漫抒情派的中坚
- 559 一 小说艺术的开拓与自叙传文学
- 566 二 感伤放荡与愤世嫉俗的心理二重性
- 574 三 技巧与文体

583	四	艺术观和创作方法
592	第三节	郭沫若：浪漫抒情小说向左发展
592	一	追求幻美与抒写穷愁
599	二	历史小说和向写实转化
607	第四节	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家
607	一	三分抒写自我和七分嗜写情爱
615	二	走入滥调绝境和坠入附逆深渊
623	第八章	浪漫抒情派小说（下）
623	第一节	创造社的其他浪漫抒情作家
624	一	陶晶孙
631	二	周全平
639	三	倪貽德
648	四	叶灵凤
657	第二节	浪漫抒情小说的支流及余波
664	一	滕固
671	二	陈翔鹤
680	三	刘大杰

## 第一章

# 从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看“五四” 小说革命的必然和必要

### 第一节 小说理论变迁与启蒙主义思潮

二十世纪头五十年，是中国小说发展异乎寻常的时期，总的说来，是一个思潮锐变、文体多姿、生气勃勃的历史时期。经过一度追求与探索、蜕变与逆转，到“五四”小说产生之时，我国小说结束了漫长的古典阶段，进入文体革新与社会发展相呼应、与世界进步文学潮流相接轨的现代发展历程。

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现代小说，比以往历代小说更为饱含时代忧郁，它是觉醒者和思考者的艺术。但任何觉醒都是一个过程。现代小说是以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尤其是以戊戌政变以后的近代小说为其先导的。认真清理清末民初小说思潮和文体的线索，即可认识到，以“五四”小说为开端的现代小说，是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既具有历史提供的必要性，又具有历史提供的可能性。

戊戌维新失败后，小说成了我国新学界最为重视的艺术部门，时代风气所趋，出现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

何”的局面。<sup>①</sup>短短十余年时间，成册的小说译著梓行一千数百种；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到徐枕亚1918年创办《小说季报》，先后发行的小说期刊在五十种以上。这种小说势力的膨胀是与社会的变动，政潮的动荡，印刷业的发达有深刻联系的；同时它又是清末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重要收获。

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由萌芽渐臻高峰，历时约有半个世纪。十九世纪上半叶，即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渐次走向穷途末路。鸦片战争以一种灾难性事件的形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从这个时期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值得尊敬和纪念的启蒙思想的前驱者，但启蒙主义终究尚未成为广泛的时代思潮。龚自珍早已对“夜之漫漫，鸛旦不鸣”的社会现状感到忧虑，他的诗文之中已隐隐传出叛逆之音，梁启超后来还说：“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sup>②</sup>但他用以抨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武器，是来自“公羊今文学”和佛学的。魏源编成《海国图志》这部世界史地巨著，成为放开眼界看世界的最早人物之一，并且他多少感到了“人心积患”的严重性，重申了“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sup>③</sup>的名言，但他补失救弊的办法，依然是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学习西方“格致至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直至七、八十年代，郑观应等人表达了“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sup>④</sup>的政治文化要求，主张开设学堂学习“西学”。但他们

① 康有为：《闻菴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载《南海先生诗集》卷五。

②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

③ 魏源：《海国图志叙》。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的“西学”离不开“格致制造”，他们把这些通通看作“器”，是不能代替封建社会的传家之宝“圣人之道”的，其目的在于“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sup>①</sup>。因此，这些思想家尚不足以使启蒙主义风靡于世，成为主潮。虽然历史已进入近代达半个世纪之久，但小说创作并没有与启蒙思潮相结合。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小说，如疯狂鼓吹镇压农民起义的《荡寇志》，浸染忠孝节义的《儿女英雄传》，张扬侠客锄奸的《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以及《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于民间情绪中混杂腐朽思想的气味，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小说。换言之，时代已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而一班小说家却还在做着“秉正除奸”、“荡妖灭寇”，以保封建王朝“江山永固”的迷梦，或者发泄着末世知识分子文酒风流、情场潦倒的颓废没落情绪，他们的创作是落后于时代、甚至逆时代潮流而动了。

我国近代第一次启蒙主义高潮，出现在戊戌维新前后。甲午中日战争是继鸦片战争以后更为惨酷的一幕，朝野为之震动，“列强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sup>②</sup>从“公车上书”，到组学会、设学堂、办报馆，直至“上谕变法”，朝野上下颇有几分云起龙骧之概。康有为著书立说，在今文经学的陈旧框套中掺杂进历史进化的观念；梁启超办报讲学，鼓吹民权思想要求变法；严复另辟蹊径，除了在天津《直报》发表政论，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外，又译述《天演论》，输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在中国思想界建“初凿鸿蒙”之功。

①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页。

但是，维新派在戊戌以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之上的，政变发生后，其中一些思想活跃分子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的原因，在于对“新民之道”缺乏足够注意。因此，他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提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主张，并于同年十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他是推动近代启蒙主义与小说艺术相结合的开山匠人。自然，在此前三十年，即1872年，蠡勺居士在《听夕闲谈·小叙》中，指出小说艺术“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运用卢梭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论述了小说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指出小说写“人心所构之史”，区别于历史写“人身所作之史”，揭示小说力量可以达于“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这些见解触及小说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及其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带有近代启蒙主义性质。但它们的社会历史影响，均远不及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阴历10月《新小说》创刊号上的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史称“康梁”。曾任《时务报》主笔，为戊戌变法最著名的宣传家。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既坚持立宪保皇，又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又组织研究系，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晚年任清华研究院导师。生平著述极丰，编为《饮冰室合集》一百四十八卷。

梁启超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舆论界之骄子”，思想文字往往瑕瑜互见，既带有惊人的敏锐性、广泛性和煽动性，又带有明显的驳杂、浮浅和偏颇之处。这些特点在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有明显表现。在小说的外在关系上，他认识到小说革命在启蒙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皆有“不可思议”的支配力，因此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无疑是得风气之先而又惊世骇俗的；但他忽视了小说首先是社会生活和心理的形象的反映和评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启蒙主义和小说艺术结合的神殿建筑在沙滩海涂之上。在小说创作与艺术传统的关系上，他看到了古典小说的思想倾向难以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新小说”或“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倡导寄托“政治之议论”的“政治小说”，这无疑抓住了革新小说的一个根本问题；但他又不分良莠、甚至以良为莠地痛斥古典小说“海淫海盗”，“陷溺人群”，“含有秽质”，“含有毒性”，表现出虚无主义倾向，不利于小说创作在革新思想倾向的同时，建立新鲜的民族风格。他从启蒙宣传家的角度看问题，揭示“小说之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接触到小说艺术影响社会心理的某些特点；但他过于重视小说的教诲作用，而或多或少忽视小说的审美品性，导致一时“政治小说”的致命短处，即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sup>①</sup>。《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一篇历史性文献，它的光与影不同程度地笼罩着本世纪头十年许多小说论文，它以疾风迅雷之势，打破了歧视和轻视小说的封建文

<sup>①</sup> 黄遵宪：《致梁启超》（1902年11月），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册（1902—1905年）。

学观念。继《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刊物相继创刊，月月续出，林林总总，揭开了我国小说极其繁荣的一页。清末小说风气与梁启超有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既开创了一个欲借小说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时代，也开创了一个小说译作车载斗量和粗制滥造兼杂的时代。

对于梁启超小说理论上的偏颇，其友朋之辈在《新小说》的《小说丛话》栏，作了枝枝节节补充和修正。其弟梁启勋（曼殊）不苟同于兄长的虚无主义，而推崇中国古典小说：“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社会之历史（这就佳本而论，非普通论也）。……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虽有狭隘或空疏之嫌，但他尊重民族传统小说的意见是不曾随波逐流的。此外，侠人、平子、昭琴皆对“水浒”、“红楼”时有好评，这是与梁启超相牴牾的。梁启超的莫逆之交狄平子甚至把《红楼梦》拉进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小说”圈子里，谓“《红楼梦》一书，系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满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为开国元勋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这种议论，实为十余年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滥觞。对于梁启超忽视小说源于生活的偏颇，梁启勋（曼殊）更是与之针锋相对，指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他似乎点着梁启超的鼻子在责问：“今之痛祖国社会之腐败者，每归罪于吾国无佳小说，其果今之恶社会为劣小说之果乎，抑劣社会为恶小说之因乎？”狄平子又发表专门论文，“以文学之眼观

察”小说，指出小说具有“繁”（详尽）、“今”（切近）、“泄”（明白）、“俗”（通俗）、“虚”（幻想）等五个互相联系的特征。其中也涉及到小说与生活的关系：“小说者，专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习闻之事，而挑剔之、指点之者也。”“小说者，社会之 X 光线也。”<sup>①</sup> 表述颇精彩，惜乎该文主要谈小说文体问题，对此只是偶尔涉及罢了。总而言之，本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小说观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代表，较重视小说的通俗性和功利价值，不同程度地淡漠了小说的真实价值和审美价值，即是说，他们偏重于“善”，而偏废于“真”与“美”。因此，他们开了一时风气，却是用一种不健全的理论去开风气的。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并发刊《民报》，有组织、有计划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大论战。论战地点遍及上海、广州、香港和东京、横滨、檀香山、旧金山、新加坡，论战内容包括“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诸问题。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但是辩论主要围绕两派的政治纲领而展开，在文学界、尤其在小说界，没有形成壁垒分明的论战局面。革命派一些杰出的宣传家如邹容、陈天华，是注意启蒙主义的宣传的。邹容的《革命军》极为推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颂扬其学说“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并毅然以启蒙主义闯将自许：“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陈天华的《警世钟》，哲理光辉不及《革命军》，而火药味的浓烈容或过之，清浅晓畅，如鼓如钟。它也主张用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史》，“喊醒祖国同胞

<sup>①</sup> 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年《新小说》第7期。

的迷梦”。陈天华写过小说《狮子吼》，在第五回提出创作“新理想小说”的口号，透露出革命派把革命启蒙主义和小说创作相结合的某种愿望。但是，1905年革命、改良两派大论战前夕，邹容病死于上海西牢，陈天华于日本大森海湾自杀，革命派失去了两个最有青春锐气的宣传家。章太炎对革命虽有巨大的“文字功”，甚至有人称他为“新中国之卢骚”<sup>①</sup>，但他以“光复”代替“革命”，醉心于佛学和古学，对通俗宣传殊少用心。蔡元培是有启蒙思想的，但他1907年以后，长期留学德国，专治心理学和哲学史，因此他的启蒙业绩唯有留在民元和“五四”时期去论述了。章、蔡、邹、陈四人的情形表明，他们的革命思想远比梁启超激烈，但促使启蒙主义与小说结合的贡献，却远逊于梁启超。

出而填补真空，与梁启超持异的，是黄摩西、徐念慈和王无生。黄、王后来列名于南社，是革命派中的文士，可惜他们都不是五虎上将，而是聊充先锋的廖化，不足以抵消曾一度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的影响。但也不容小看他们，他们提供了一些比梁启超更公允、更科学的小说艺术观念。王无生（别号天僊生）抱负颇大，模仿“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口吻，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表示要“殚精极思，著为小说，借手以救国民，为小说界中马前卒”。这篇《史论》从体式方面探索各种类型小说的源流，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入手，阐明我国古代小说的思想意义。前者难免空疏和芜杂，后者则颇有真知灼见。他把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创作动机概括为三：“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从而高度地评价

<sup>①</sup> 1911年11月16日（旧历9月26日）《民立报》社论：《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

了我国优秀古典小说的社会政治价值，以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取代了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倾向。

《小说林》的主编黄摩西<sup>①</sup>的小说观，比王无生更为内在，更有价值。他把“真”和“美”的原则引进小说领域，是和梁启超持异，而和王国维相呼应的。王国维要求文学真实地描写自然人生，抒写作者的真情实感，即所谓诗人须写“真景物，真感情”<sup>②</sup>，“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sup>③</sup>。他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强调文学中“纯美”的价值。《红楼梦评论》写道：“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在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在王国维心目中，美是透明的水晶体，容不得半点社会功利欲念的沾染。王国维走向与梁启超相对峙的另一极端：他重美轻善，梁重善轻美；他的美学观使人宁静，梁的美学观使人燥热。在这种对峙中，王国维虽然介绍了西方美学观点，却远离了时代要求的启蒙主义思潮。黄摩西在《小说林》上发表《小说小话》，署名为“蛮”，可见他不如王国维“雅驯”。他这样谈论真实：“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sup>④</sup>所谓“镜中取影”，就是说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之反映，但这种真实并非见美不见丑，求解脱不求入世。他的真实观与王国维不同之点，在于真美之中，须含有作者的社会批评和道德判

① 黄摩西（1855—1913），原名振元，字慕韩，中年易名曰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博学多才，凡经史、诗文、音律，以及方技，循甲之类，均知其大义。1900年前后，与章太炎相友善，同为东吴大学文学教授。主编《小说林》，撰有《小说林发刊词》和《小说小话》。辛亥革命后，对现实不满，歌哭无常，患精神病而死。

②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③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

④ 蛮：《小说小话》，载1907年《小说林》第1卷第1期。

断，做到“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同时，这种批评和判断是溶解在形象之中的，如明镜照物，寂然无声，不要如同古代戏剧那样，“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使小说描写毫无余味。黄摩西还把这种真实观引进人物性格塑造领域。他认为，性格描写要真实，就必须做到既“匪夷所思”，又“确为情理所有者”，合情合理地绘出各个人物特殊的本色和行为，因此，写出的人物性格必须是复杂的，有特点、有缺陷的：“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水浒传》之宋江，《石头记》之贾宝玉，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几于全知全能，正令观者味同嚼蜡，尚不如神怪小说之杨戩、孙悟空腾挪变化，虽无理而尚有趣焉。”<sup>①</sup> 有理为真，缘美得趣，黄摩西的话或深或浅地猜测到这一点，确有真知灼见含于其中，可惜当时汗牛充栋的小说，包括《小说林》中的小说，没有几篇是自觉地实践这种见解的。

在强调小说的审美属性中，黄摩西与徐念慈（东海觉我）<sup>②</sup>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而徐念慈论述得具体和深入一些。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指出：“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他把是否具有“审美之情操”，视为文学作品与哲学、科学著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失去“审美之情操”也便失去文学之特征，“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这是针对梁启超的，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出一

① 蛮：《小说小话》，载《小说林》第1卷第1期。

② 徐念慈（1874—1908），字彥士，别号东海觉我，江苏昭文人。年少时即通英、日文，擅长数学。参与《小说林》编辑工作，是当时知名的侦探小说翻译家。



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的时风，是“吠声四应，学步载涂”<sup>①</sup>。其实，以小说鼓吹国民进化，促进社会改良，岂可过分非议？黄摩西在强调小说的审美属性上，比梁启超有所前进，而在小说与启蒙主义相结合上，却比梁启超有所后退了。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似乎是同该刊主编黄摩西经过一番切磋琢磨之后写成的。他强调的也是小说的审美价值：“余不敏，尝以臆见论断之：则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他援引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从五个方面论述小说的美学特征，即艺术的完整性（“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哲理性（“具象理想”）以及艺术的形象性、感情色彩和理想色彩。他把理性和情感作为小说审美属性的基本要素，比起梁启超重理轻情的倾向更为完整和科学。他不仅沿用梁启超的术语，把小说列为美学之“上乘”（比梁氏少一“最”字），而且对梁启超强调的、与启蒙主义相联系的小说“薰、浸、刺、提”四种作用也予首肯，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

晚清一代，最有影响的是梁启超的启蒙主义小说理论，而最值得珍视的是徐念慈、林纾等人对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初步探索和直观猜测。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皆可看作“五四”时期新小说观的先驱。徐念慈认为：

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激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

<sup>①</sup> 以上所引皆见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载1907年《小说林》第1期。